

秦恩复校刻《鬼谷子》考论

马 昕

内容摘要:清代著名校勘家、刻书家秦恩复,在乾隆五十四年(1789)和嘉庆十年(1805)先后两次校刻《鬼谷子》,这两个版本分别被视为《鬼谷子》两大版本系统中的杰出代表。本文梳理秦恩复两次校刻《鬼谷子》的具体过程,并且深入到版本内部,对其校勘得失做出新的评价。秦恩复刻印乾隆本时,坚持“不校校之”的校勘原则,但因为采用“先天不足”的底本,造成很多缺憾。刻印嘉庆本时,虽然底本选择精良,但放弃了“不校校之”的原则,因其大量改字行为而使嘉庆本同样问题重重。研究使用《鬼谷子》一书时,应对此复杂情况有所了解。

关键词:《鬼谷子》 秦恩复 校勘 “不校校之”

《鬼谷子》是战国时代纵横家的理论著作,相传为隐士鬼谷子所作,内容以权谋法术为主。该书现存版本众多,经研究者梳理,大致可分为两个系统^①:一是道藏本系统,以明代《正统道藏》为祖本,后世数十种版本皆从此出;二是钱本系统,即钱遵王述古堂旧钞本,“乃据宋本传录者”(参见后文所引徐鲲嘉庆元年跋),其后同样衍生出很多版本。在《鬼谷子》的流传过程中出现过有趣的现象:清代著名校勘家和刻书家秦恩复,分别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和嘉庆十年(1805)两次校刻《鬼谷子》,但这两种刻本却分属于上述两个版本系统,而且这两种刻本都对《鬼谷子》在清代中晚期的流传和接受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无疑成为清代校勘史和刻书史上的一道奇观。

一、秦恩复生平概况与文献学成就

秦恩复(1760-1843),字近光,一字澹生,号敦夫,扬州人。他出身于扬州有名的书香世族,父亲秦觫是乾隆十七年(1752)进士,通晓经史,娴熟艺文^②。

^①许富宏:《鬼谷子集校集注·前言》,中华书局,2008年,第16-20页。

^②徐世昌编:《清儒学案小传》,周骏富主编:《清代传记丛刊》第6册,台湾明文书局,1985年,第662页。

秦恩复在乾隆五十二年(1787)考取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乾隆五十五年(1790),因丁内艰而归里。丧满服阕,将复起入都时,却不幸“疽发于背,医治就痊,而体弱不支,由是闭户养痾”。嘉庆十一年(1806),他病愈后再次入都供职,次年(1807)即归里。这次里居期间,正值阮元抚浙。受阮元之请,主讲诂经精舍。嘉庆十四年(1809),又受两淮盐政阿克当阿之请,主讲扬州乐仪书院。嘉庆二十三年(1818),秦恩复再次入都。然而,“阅四年,仍乞假归,晚年自号狷翁,明其志也”^①。晚年归隐期间,他纵情于吟咏,积极参加扬州文坛活动。道光二十三年(1843)去世。

秦恩复“与人谦抑,口不谈学问,以是世无知者”^②,但是不谈学问并不意味着粗鄙无学。阮元就盛赞他“学问渊雅,于书无所不窥”^③,而其主要的学术贡献并不在于著书立说,而是对古籍的编刻与校勘。他一生编刻古书众多,因其“慎选良工”,刻书质量精良,以至“海内争购”,获“秦版”之誉。曾国藩就将秦恩复的影宋刻本看作清朝私家刻书的代表,说:

国朝刻书,远胜前代。殿板如《十三经》、《廿四史》、《全唐诗》、《图书集成》、《五经萃室书画谱》之类,凡初印者,无不精雅绝伦。外板如卢雅雨、卢抱经、黄蕙圃、孔昇轩、毕舛山、孙渊如所刻丛书,均工雅可宝。即胡果泉、张古愚、秦恩复、汪孟慈等所刻影宋诸书,及秀野草堂《韩诗》、一隅草堂《白诗》之属,亦皆精绝。^④

曾国藩将秦恩复刻书与卢见曾、卢文弨、黄丕烈、孔广森、毕沅、孙星衍、胡克家、张敦仁、汪喜孙、顾嗣立、汪立名等人相提并论,足见推重之至。

秦恩复在编刻的同时还从事校勘,以保证所刻古书达到形式和内容的兼美。张之洞在《书目答问》卷末《校勘之学家》中,胪列出三十一位校勘家,称“诸家校刻书并是善本,是正文字皆可依据”^⑤,其中就包括秦恩复。叶德辉《书林清话》也称赞他是“纯乎校勘家”^⑥。可见他的校勘成果得到了当时人的公认。

秦恩复最负盛名的古书校刻成果,当推“石研斋八种”,“尝刊行唐卢重元注《列子》、梁陶弘景注《鬼谷子》、晋李轨注《扬子法言》、唐赵元一《奉天录》、宋刘球《隶韵》,均海内孤本;骆宾王、李元宾、吕衡州三唐人集,亦根据宋刻,加以考证;号‘石研斋八种’”^⑦。这些著作当中,就属《鬼谷子》的刊刻情况最为复

①英杰、晏端书等纂修:《续纂扬州府志》卷九《人物志七》,清同治十三年(1874)刻本。

②汪兆镛纂录:《碑传集三编》卷三七《秦恩复传》,《清代传记丛刊》第126册,第281页。

③秦恩复:《享帚词》,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江都秦熾刻本。

④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卷六《致刘星房》,《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4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15页。

⑤张之洞著、范希曾补正:《书目答问补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68页。

⑥叶德辉著、李庆西标校:《书林清话》卷九《洪亮吉论藏书有数等》,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18页。

⑦支伟成编:《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岳麓书社,1986年,第529页。

杂,学界对此也缺少研究,下文就此问题展开讨论。

二、秦恩复校刻《鬼谷子》始末

如上文所述,秦恩复于乾隆五十四年和嘉庆十年两次校刻《鬼谷子》,两次刻本中的序跋对了解秦氏校刻过程至关重要。国家图书馆还藏有由秦氏刻本衍生的两种批校本、一种名家题跋本和一种抄本,其中保存的批校题跋资料也对复原秦氏校刻《鬼谷子》的细节多有裨益,故不避繁复,详记各本情况如下:

第一种是在乾隆刻本之上完成的手书批校本(馆藏号12222),下文简称为“手校本”。此本卷内有严元照、陈鱣、鲍廷博、徐鼐等人的批校,卷首有手书的陈鱣乾隆五十九年题识和徐鼐乾隆五十九年题识,卷末有严元照乾隆五十九年秋跋。

第二种是缪荃孙在嘉庆刻本之上完成的校本(馆藏号8206),下文简称为“缪本”。此本卷末有缪荃孙手录严元照乾隆五十九年秋、冬两篇跋,徐鼐嘉庆元年跋,劳权咸丰七年六月跋,缪荃孙跋及章钰民国二年人日跋。

第三种是傅增湘在嘉庆刻本之上附以手书题跋(馆藏号148),下文简称为“傅本”。此本卷首有姚莹光绪二十年跋,卷末除傅增湘手录前人诸篇题跋外,还有傅增湘民国元年跋及题识各一篇。

第四种是同治八年(1869)刘履芬据嘉庆本抄本(馆藏号14717),下文简称为“刘本”。此本卷首除前人习见序跋外,还有丹铅精舍主人(劳权)咸丰七年中秋跋,卷末则为周广业跋、卢文弨跋、阮元跋,及手书章钰跋二篇和刘履芬题识,并录严元照题识二篇、徐鼐题识、劳权题识、缪荃孙题识、傅增湘题识、秦恩复嘉庆十年序;卷内天头处抄缪荃孙、章钰校记;卷末为周广业跋、卢文弨跋、阮元跋,并手书章钰民国二年十一月跋、章钰民国二年腊八跋、刘履芬同治八年题识。

为条理清楚起见,按各本形成的时序,列表说明如下:

版 本	位 置	题 跋
乾隆本	卷 首	秦恩复乾隆五十四年序
	卷 末	阮元乾隆五十三年跋
手校本	卷 首	秦恩复乾隆五十四年序 陈鱣乾隆五十九年题识 徐鼐乾隆五十九年题识
	卷 末	严元照乾隆五十九年秋跋
嘉庆本	卷 首	秦恩复嘉庆十年序
	卷 末	周广业乾隆四十六年跋 卢文弨跋 阮元乾隆五十三年跋

(续表)

版 本	位 置	题 跋
缪本	卷 末	严元照乾隆五十九年秋跋(缪荃孙手录) 严元照乾隆五十九年冬跋(缪荃孙手录) 徐鼐嘉庆元年跋(缪荃孙手录) 劳权咸丰七年六月跋(缪荃孙手录) 缪荃孙跋 章钰民国二年人日跋
傅本	卷 首	姚莹光绪二十年跋
	卷 末	严元照乾隆五十九年秋跋(傅增湘手录) 严元照乾隆五十九年冬跋(傅增湘手录) 徐鼐嘉庆元年跋(傅增湘手录) 劳权咸丰七年六月跋(傅增湘手录) 缪荃孙跋(傅增湘手录) 傅增湘民国元年跋 傅增湘民国元年题识
刘本	卷 首	劳权(丹铅精舍主人)咸丰七年中秋跋 严元照乾隆五十九年秋跋(刘履芬手录) 严元照乾隆五十九年冬跋(刘履芬手录) 徐鼐嘉庆元年跋(刘履芬手录) 劳权咸丰七年六月跋(刘履芬手录) 缪荃孙跋 傅增湘民国元年跋 秦恩复嘉庆十年序
	卷 末	周广业乾隆四十六年跋 卢文弨跋 阮元乾隆五十三年跋 章钰民国二年十一月跋 章钰民国二年腊八跋 刘履芬同治八年题识

从上表所列序跋和题识中,可以探知秦恩复校刻《鬼谷子》的具体过程。

秦恩复乾隆五十四年序云:

《鬼谷子》,陶弘景注,三卷,阳湖孙渊如同年读《道藏》于华阴岳庙时所录本也。乾隆丁未(1787),恩复与渊如校书于文渊阁,暇日出以相示,计欲付梓,旋以乞假归里,不果。戊申(1788)冬来京师,因取而校之……恩复因刺取唐宋书注所引,校正文字一二,旧注亦掇而存之,附于本文之下;其或他书所引本文,今本不载,及称鬼谷事迹足相考证者,并附录于后,以备观览焉。

这就是乾隆本刊刻的大概情况。这篇序文中揭示乾隆本的底本是《道藏》本，是孙星衍从中抄出的。当时孙、秦二人共事于文渊阁，孙将其抄本示与秦，谋付梓而未果。陈鱣乾隆五十九题识又云：“忆丁未（1787）客京师，孙渊如编修以所储藏本属校，后秦敦夫编修取以付梓。”可见，在乾隆五十二年丁未，孙星衍还将抄录出的《道藏》本交给过陈鱣校勘。次年戊申冬，秦恩复返回京师，再度“取而校之”。并将他书所引的《鬼谷子》佚文和记载鬼谷子事迹的史料汇编为《附录》。序中未交代的工作还有，秦氏为《鬼谷子》编纂了《篇目考》一篇，也附于书中。《篇目考》汇集了历代有关《鬼谷子》的书目著录材料，上起《隋书·经籍志》，下至钱曾《读书敏求记》。经历了这番曲折之后，秦恩复终于在乾隆五十四年将此书刊刻完成。由于秦氏与阮元交往深厚，阮氏便欣然为乾隆本作跋。他在跋中强调秦氏校刻《鬼谷子》的重要意义：“窃谓书苟为隋唐《志》所著录而今仅存者，无不当精校传世，况是编为纵横家独存之子书。陶氏注又世所久佚，诚网罗古籍者所乐睹也。”

秦氏第一次校刻《鬼谷子》时，尚未见到钱曾述古堂旧钞本。至于钱本的来源，据周广业跋所云：“绿饮鲍君购得《鬼谷子注》钞本，属余是正。”周广业（1730—1798），字勤圃，号耕厓，浙江海宁人，乾隆四十八年（1783）举人。清廷编纂《四库全书》时，参与其事的名流学者，争相聘其担任校勘，可见他是当时有名的校勘家。周跋的落款时间是乾隆四十六年（1781），他帮助鲍廷博校正钱本应该也在这一年。但周氏采用何种方法进行校勘，是在有参校本的情况下以对校为主，还是在没有参校本的情况下以理校为主，已无从知晓。

十多年后的乾隆五十九年（1794），鲍廷博又持此本，先后请徐鼐、陈鱣、严元照等人校勘。国家图书馆藏乾隆本之手校本就全面地展现了这一过程。

首先是在乾隆五十九年夏，鲍廷博将钱本交予徐鼐，请其校勘。徐鼐嘉庆元年跋云：

甲寅（1794）夏，鲍君以文出所藏《鬼谷子注》钞，属余与坊刻对勘。坊刻出《道藏》，其讹脱至多，不可枚举。鲍君所藏为钱遵王旧物，乃据宋本传录者。如卷首所题“东晋贞白先生丹阳陶弘景注”一行，系沿南宋《中兴书目》之误，似即当时馆阁著录之本。余既朱笔细勘后，手录清本一通。且属吾友钱君广伯证定之，因缀数语于简末。

徐鼐，字北溟，浙江萧山人。《文献征存录》云：“（鼐）少补诸生，不事帖括，专习经训，时人讥之，不屑也。仪征阮元督浙学，肄业诂经精舍。其《经籍纂诂》，鼐校证成之……孙志祖著《读书脞录》，颇采鼐谈论。”^①从上引徐跋可知，徐鼐校过之后，誊录清本，又请友人钱馥（广伯）证定之。这是第一阶段。

同年秋，鲍廷博又持此本，请严元照校勘。严元照乾隆五十九年秋跋云：

^①钱林：《文献征存录》卷七，《续修四库全书》第54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24—325页。

壬子(1792)之岁,予于虎邱萃古斋钱氏得此旧钞本。闻有新刻本,未之见也。今春,寄示卢抱经学士,为校一过。云:“新刻注中脱十餘字,得此本补之。孟秋之月,过知不足斋,向以文先生假得旧钞本,字甚老草,据以文云,是钱遵王述古堂本。”予亦未之信。归而以三本对校,新刻本脱落错误极多,上卷《内捷》篇白文、注文共脱四百十有二字,而此本亦同。其餘更不必言。不有钱氏本,则无以见其真矣。大抵此本少愈于刻本,而大段皆同。予既取刻本校阅一过,复以餘力校此本。正讹补阙,不一而足,庶可读矣。呜呼!书籍佳否,故不可以钞手精粗论。若不以两本对校,则几乎不弃彼而留此。又重叹夫刊刻古书者之不可轻率,当博访善本,以资参考也。乾隆五十有九年秋八月望前一日,芳椒堂主人严元照校罢识。

严元照(1773-1817),字元能,一作修能,号悔庵,又号蕙榜,归安(今浙江湖州)人。好藏宋版书,有“书癖”之称。致力经传,绝意仕进,于声音训诂之学,多所阐发。苏州书商钱听默为其精神所动,慷慨赠以宋版书。积年,藏书数万卷,多宋元刻本。从上引跋文来看,严氏于乾隆五十七年壬子从钱景凯(萃古斋)处得到一个旧钞本,后来他在校记中称此为“文本”,看来他认定这正是苏州文氏旧藏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钞本。当时已有乾隆刻本,但严氏尚未见到。乾隆五十九年,他将文氏钞本寄示卢文弨,请其校正。卢氏告知严元照,他最近见到另一种旧钞本,即钱本。严氏便将乾隆刻本、文氏钞本和钱本放在一起比勘,发现乾隆本“脱落错误极多,上卷《内捷》篇白文、注文共脱四百十有二字”,而文氏钞本和乾隆本一样。这倒不难理解,因为文氏钞本也属《道藏》本系统^①。严氏跋的落款时间是“八月望前一日”,即八月十四日,他作此书校勘显然在此之前。国图藏乾隆本手校本的天头处,保留了严氏的校记。卷上有严氏批语:“廿七日午前校至此,吃饭。”卷中严氏批语又云:“傍晚校毕,是日阴,赖有校阅之事,否则殊闷人也,元照书。夜中放櫂,作武林之行。”卷下严氏批语曰:“八月三日晨,自武林返,抄过张氏《春秋集传》两叶,遂校阅此卷至此,腕痛不能写矣。”可知严氏校订《鬼谷子》是在七月二十七日至八月三日之间。严氏校记中屡引“钱本”、“文本”,并据之直接改正乾隆本文字。这是第二阶段。

手校本中还保存了陈鱣乾隆五十九年题识:“甲寅(1794)重九,鲍绿饮先生以此本见示,复取家藏《子汇》本通校一过。”可见乾隆五十九年甲寅九月九日,鲍廷博又将钱本交予陈鱣,嘱其校勘。陈氏便据《子汇》本校之,而《子汇》本也是从《道藏》本发展出来的版本。手校本的天头处保存了陈鱣的校记,多是据《子汇》本出校,且常与严氏意见不同。如《反应》篇“己欲平静以听其辞,察其事,论万物,别雄雌”,注云:“谓听言之道,先自平静,既得其辞,然后察其事,或论序万物,或分别雄雌也。”严氏校记云:“钱本作雌雄,注亦尔。”陈氏校

^①许富宏:《鬼谷子集校集注·前言》,第18页。

记则谓：“案《子汇》本亦作雄雌，以音读之，当作雄雌，为合注同。”陈鱣一方面据《子汇》进行他校，一方面又从读音押韵的角度进行理校，认为作“雄雌”更合理。又如《内捷》篇“若蚨母之从其子也，出无间，入无朕，独往独来，莫之能止”，注云：“蚨母，螳螂也。”严氏校记云：“蚨，文本作蚨，下仿此。”陈氏则据《尔雅》及郭璞注，认为“此文则作蚨，而注语本郭也”，但又考诸《说文》、《搜神记》，认为本文应作“蚨”，注文误为“蚨”，情况比严氏想得复杂一些。再如《忤合》篇“近孰不如”，注云：“夫忤合之道不能行于胜，已而必用之于不我若，故知谁不如，然后行之也。”严氏谓“钱本孰作就，讹”，并据改乾隆本文字。陈氏则指出：“观注‘故知谁不如’，‘谁’字宜作‘孰’字为是。”仍然主张从乾隆本用字。从这几例可见，严氏对秦氏乾隆刻本并不满意，对钱本、文本则非常信任，甚至到了佞信的地步，上述第三例尤其明显。相比之下，陈鱣更加实事求是一些，对严氏的校改意见作了一些修正，认为钱本未必尽是，《道藏》未必尽非。叶德辉《郎园读书志》卷五也对《道藏》本表达了类似意见：“据云《道藏》本讹舛不少，因重付剞劂……余谓《道藏》与宋钞，其原不同，则文字不必相合……谓宋钞胜于《道藏》，则余不敢苟同。”^①这是第三阶段。

国图藏嘉庆本缪荃孙校本卷末有缪荃孙手录的严元照乾隆五十九年冬跋，其文云：

予既得善本，校此一过，亦殊漏略。季秋之月，抱经学士过予芳椒堂，取去，校阅一过。又指出数处，良足是正。吁！予年二十二耳，而心且粗率如此，视抱经先生，真不啻霄壤之别矣。孟夏廿三日。元照又识。

此跋落款时间为“孟夏”，但跋文中又有“季秋之月”，则从时次上来看，两者必有一误。上文已述严氏校订该书的时间在当年的七月末八月初，此跋严氏说“既得善本，校此一过”，则“季秋之月”所言不误，此处“孟夏”当作“孟冬”。因知乾隆五十九年九月，卢文弨拜访严元照时，又校阅一过，指出数处错谬。从严元照十月二十三日的落款时间来看，卢文弨拜访严元照应是在陈鱣校勘之后的事情。这是第四阶段。

大概在这之后不久，卢文弨又将校勘后的乾隆刻本和钱本寄给秦恩复，使秦恩复惊觉前次刊刻之非，产生了重刻的念头。秦恩复嘉庆十年序云：

是书刻于乾隆己酉，仅据孙渊如观察华阴岳庙所录本雠校刊行。卢抱经先生重加勘定，至再至三，最后邮示述古堂旧钞，始知《道藏》所存讹脱正复不少。读书固难，校书亦不易也。因重付剞劂，一以钱本为主，其有钱本所无而《藏》本所有者，审其异同，互相考证。又刺取唐宋书注所引旧注，掇而存之，附于本文之下。

这一次，秦恩复改以钱本为底本重新刊刻。他还尽数吸收了之前徐鼐、严元

^①叶德辉：《郎园读书志》卷五，湖南图书馆编：《湖南近现代藏书家题跋选》第1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250页。

照、陈鱣、卢文弨等人的校勘意见。将嘉庆本与乾隆本相比勘会发现,严元照等人校记中提到的一些错误,在嘉庆本中大多得到了改正。此外,秦氏还从唐宋书注中辑出《鬼谷子》旧注若干,附于正文之下。这是第五阶段。

经过以上五个阶段,终于形成了嘉庆本,这也是《鬼谷子》众多存世版本中质量最高的一种。缪荃孙跋云:

《鬼谷子》,世以嘉庆乙丑(1805)石研斋刻本为最佳。秦本出于卢抱经所据鲍绿饮藏述古堂本。秦氏又自辑古今论《鬼谷子》者为《附录》,较乾隆己酉刻《道藏》本高出不啻倍蓰。

堪为公论。今人许富宏作《鬼谷子集校集注》,原文及陶弘景注文便以嘉庆本为底本^①。

三、秦恩复校刻《鬼谷子》的功过得失

在上一节,我们根据乾隆本、嘉庆本及各自衍生版本中所保存的序跋、题识,大致勾勒出秦恩复两次校刻《鬼谷子》的具体过程。但是,要对乾隆本和嘉庆本的功过得失做出评价,还要深入到版本内部的文字差异和具体的校记批语。

1. 乾隆本得失评议

如上文所述,秦恩复刊刻的乾隆本虽以《正统道藏》为底本,却不是直接据《道藏》刻印,而是先经历了孙星衍的抄录和陈鱣的校勘。笔者将乾隆本与《道藏》本进行比勘,除避讳字外共统计出75处异文,可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道藏》本无误而乾隆本反而有误的异文,一共12处;第二类是《道藏》本明显有误而乾隆本予以改正的异文,一共46处;第三类是《道藏》本和乾隆本两可的异文,一共17处。第一类应属无心之失,二、三类则基本属于主动校改。那么问题就来了:第一类异文是在孙星衍抄录时出的错,还是秦恩复校刻时出的错;而后两类异文是孙星衍抄录时顺手所改,还是陈鱣校勘时所作的订正,抑或是秦恩复刊刻时所作的校改呢?我们只能根据有限的材料,做出一些最基本的推理。

第一类异文基本是无意间造成的谬误,那么无论是谁造成的,都不可能在校记和批语中特意说明,这给判定错误责任人增加了难度。不过,有两条异文可以推测是由孙星衍或陈鱣造成的,而与秦恩复无关。第一条在《本经阴符七篇》注文中,《道藏》本在“乖候而谋,非失而何”二句下有十六字,乾隆本全脱。《道藏》本每行十七字,注文低一格,一行恰是十六个字,对于这样大的文字差别,乾隆本在此处却没有秦恩复的任何校记,应不是他省略了校记,而是在孙星衍从《道藏》抄录时就已出现错误,秦恩复在没有直接看到《道藏》本的情况下当然无法觉察。第二条在《本经阴符七篇》正文中,《道藏》本作“散势者待间

^①许富宏:《鬼谷子集校集注·例言》,第1页。

而动”，乾隆本脱“势”字，秦恩复校记云：“一本作‘散势者’。”从上下文来看，作“散势”明显更优。如果秦恩复所见底本有“势”字，便不会出此校记，因此这处脱文也跟秦恩复无关。

后两类异文都属于主动校改，我们首先要搞清：秦恩复在从事校勘时是否有改字的习惯？秦恩复在乾隆本中一共留下128条双行小字校记，对正文进行改字的仅有7条。可见他对改字非常慎重，这与顾广圻“不校校之”的校勘学主张非常接近。秦恩复与顾广圻有很深的交往，他主持刻印的很多书籍，也都是和顾广圻合作完成的，甚至一度请顾氏为其作代校。但二人的交往始于嘉庆年间顾氏客居扬州之时，乾隆本刻印时，顾广圻只有二十岁。因此，秦恩复慎于改字的习惯并非受顾广圻影响，更有可能是他自己固有的主张。在秦恩复仅有的7处改字中，有5条是在有版本依据的情况下依对校法做出的，另有1处是根据他书引文改字，1处是根据上下文进行本校，而绝无用理校法改字的情况。另外，有些时候即便在校记中已经对底本文字提出明确反驳，却仍然不改底本之字。但我们回过来看乾隆本与《道藏》本的后两类异文，一共63处，如此频繁的改字行为就已经不符合秦恩复的校勘习惯了；况且这些改字案例中有相当一部分使用了理校法，这也与秦恩复的习惯不符。因此我们得出推论：从《道藏》本到乾隆本的大量校改，基本上不是由秦恩复做出的。

再看一些具体的异文，也能得出相同的结论。(1)《捭阖》篇，《道藏》本作“志意、喜欲、思虑、智谋，此皆由门户出入”，乾隆本无“此”字，秦恩复校记云：“《意林》作‘智谋皆从之出’。”秦氏的关注点完全在“由门户出入”和“从之出”的差别，对“此”字的有无并未做出类似于“据某本删‘此’字”这样的说明，可见他看到的底本就已经没有“此”字了，这处脱文应是孙星衍或陈鱣造成的。(2)《捭阖》篇注文，《道藏》本作“能谓材能”，“材”字乾隆本作“才”，严元照校记中引录文本、钱本均作“材”，乾隆本在其他地方也都作“材”，而且从先秦文献的用字习惯来看，“材”字更胜，但秦恩复刊刻嘉庆本时并未改为“材”，很可能秦恩复认为“材”、“才”二字的差别无关紧要，不必校改。由此可知，由《道藏》本的“材”变成乾隆本的“才”，秦恩复也完全没有改字的动机。(3)《捭阖》篇注文，《道藏》本作“股肱尽其力”，乾隆本作“股肱各尽其力”，严元照校记引录钱本作“股肱咸尽其力”，嘉庆本却仍作“各”。如果秦恩复不相信钱本，也应从《道藏》本删“各”字，但他坚持用“各”，说明他所看到的孙星衍抄本有“各”字，使他将此视作版本依据，以与钱本相抗。因此笔者推测，“各”字是孙星衍或陈鱣所加。(4)《揣》篇，《道藏》本作“此所谓测深揣情”，乾隆本于“所”下多“以”字，秦恩复校记云：“一本无‘以’字。”如果秦恩复看到的孙星衍抄录本没有“以”字，秦恩复应在校记中指出自己为什么要增加“以”字，但他反而去说明有一本没有“以”字，可见“以”字是孙星衍或陈鱣加上去的。

我们之所以要考察秦恩复的校勘习惯，并且证明乾隆本相比《道藏》本的异文基本是由孙星衍和陈鱣造成的，就是想说明乾隆本的一个“滑稽”之处：秦

恩复竭力去实践“不校校之”的原则,但其实他的底本就已经存在很多问题!上文所划分的三类异文中,第一类是明显的讹误,在秦恩复接手底本时就已存在,是为“先天”的缺陷;第二类是比较合理的校改,但校改者(孙星衍或陈鱣)手中并没有其他版本可作依据,只能以理校和本校为主,这与“不校校之”的思想大相径庭;而第三类是两可的异文,如果没有足够充分的理由,完全不必改字,这类校改与“不校校之”原则的抵触就更加严重。以上这些共同造成了乾隆本“先天不足”的缺憾。

另外,从上一节所引序跋材料来看,秦恩复刊刻乾隆本时似乎没有其他版本可以参校,乾隆本序文中也只提到“刺取唐宋书注所引,校正文字一二”,似乎他校刻乾隆本时主要采用的是他校法。但是,乾隆本校记中有多达80条引用了“一本”或“别本”文字,使用的是对校法。我们将这些校记与《鬼谷子》众多版本进行比对,可以很清楚地知道,秦恩复校记中的“一本”和“别本”其实正是上一节提到的苏州文氏旧藏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钞本。根据上文所述,严元照是在乾隆五十七年才得到文氏钞本的,卢文弨则到乾隆五十九年才看到文氏钞本。相比起来,秦恩复是这些人中比较早见到文氏钞本的人,他在刻印乾隆本时能够大量采录文氏钞本的资料,是乾隆刻本的一大亮点。这是前人完全没有意识到的。

2. 嘉庆本得失评议

秦恩复两次校刻《鬼谷子》,一般认为是后出转精,嘉庆本依靠更优质的底本和严元照、卢文弨等人的校勘积累,从而超越乾隆本,成为《鬼谷子》诸本中之最佳者。

秦恩复在校刻嘉庆本时,以钱本为底本,但他也清醒地认识到,钱本未必尽是,《道藏》本未必尽非。他在嘉庆本序文中说:“因重付剞劂,一以钱本为主,其有钱本所无而《藏》本所有者,审其异同,互相考证。”表达了这种较为公允的态度。在尊重底本与实事求是之间,他似乎摸索出一种平衡二者的方法——正文依照底本,底本之误则用随文校记来表达。例如《反应》篇“反以知彼,覆以知己”,陶弘景注云:“欲以知彼,先度于己。”嘉庆本校记云:“按《道藏》本作‘覆以知己’,据注应作‘知己’为是。”秦恩复很显然是据陶弘景注和《道藏》本来证明此处作“己”而非“此”。但钱本作“此”,于是不改底本,而是在校记中申明其误。这种做法既维护了底本的主体性地位,同时又能尽量给出其他参校本的有益信息,最符合今人普遍采用的校勘方法。

但嘉庆本的情况也不是都这么简单。笔者将嘉庆本与严元照批语中保存的钱本文字进行比对,发现钱本与《道藏》本之间的异文,有一部分并未在嘉庆本中反映出来。也就是说,嘉庆本并未完整展现钱本原貌,在一些不相信钱本文字的地方,秦恩复未遵底本,也未出校记,而是径直采用了其他版本的文字。例如《捭阖》篇注文,《道藏》本和乾隆本作:“首出万物,以前人用先觉后知,用先觉觉后觉,故为众生先。”严元照批语云:“钱本作‘庶’。钱本作‘民’,

误。钱本无‘用’。钱本‘先’上有‘之’字，‘先’下有‘也’字。”严氏对出校字都会用圈号作标识，结合他在此处所作的标记，可知钱本此句作：“首出庶物，以前人民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故为众生之先也。”而嘉庆本只是将“万”改成“庶”，其余几处都沿用了乾隆本的用字，而没有依照钱本。并且，嘉庆本在此处并无校记予以说明。其实，秦恩复的抉择是有道理的，乾隆本前后两个“用”正好形成对偶，而钱本将第一个“用”写作“民”，又漏掉了第二个“用”，造成文句难以读通。但是，在不采用底本文字时不加任何说明，显然有违“不校校之”的基本原则。而且，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不在少数。

有时候，在乾隆本、文氏钞本和钱本都没有依据的情况下，秦恩复还以本校或理校进行改字，并且不在校记中说明。例如《捭阖》篇注文，《道藏》本和乾隆本作“万类终始，人心之理，变化朕迹”，严元照批语云：“‘朕迹’，钱本作‘之朕’。”嘉庆本不仅遵照钱本，将“朕迹”改为“之朕”，而且依据正文，在“万类”后面加上“之”字，并且没有在校记中说明。

四、结语

前人对秦恩复校刻《鬼谷子》的两个版本，评价是比较简单的，基本都赞扬嘉庆本以善本作底本，后出转精。但经过笔者的考察，情况并不简单。乾隆本号称以《正统道藏》为底本，但秦恩复所采用的其实只是孙星衍抄录又经陈鱣校改过的版本，在底本选择上存在“先天不足”；所以，无论他如何坚持“不校校之”的校勘原则，都无法校出一个可靠的版本。嘉庆本虽有钱遵王述古堂旧钞本这样的善本作底本，但秦恩复却不再坚持“不校校之”的原则，而是频繁改字，并且在校记中不加说明，这使得钱本的面貌不能完整展现在嘉庆本中，嘉庆本的价值也因此打了折扣。只有深入到版本内部，仔细探察，才能了解到秦恩复校勘思想的变化，以及他两次校刻《鬼谷子》的得失。我们从事《鬼谷子》研究时，对此复杂情况也应有足够了解。

【作者简介】马昕，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编审。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